

文教宣传与学术研讨的进退失据：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的反映

[摘要] 建国以来，党内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于历史著作与历史人物的阅读兴趣，导致对于历史著作和人物的批判与评价往往成为历次运动的靶向所在，在《二月提纲》被撤销之前，上海社会对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基本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范畴之内，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恶化，从《海瑞罢官》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上海的文教宣传与学术研讨开始进退失据。

[关键词] 海瑞罢官；上海；二月提纲

[作者简介] 张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200235

1961年1月，吴晗将《海瑞罢官》的剧本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北京京剧团排演。1965年11月10日，在江青的安排下，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发表，该文直接否定吴晗的创作意图，将《海瑞罢官》定性为一株毒草，全国各省宣传、文教、科研部门开始讨论《海瑞罢官》问题，1966年2月12日，在彭真与中宣部的主导下，中共中央批转《二月提纲》，1966年4月，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多次修改，该通知稿被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史称“五一六通知”。^①

这样一场由高层发起的政治运动，发端于上海，以文教宣传与学术研讨为名义出现的历史剧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各种政治活动的影响下，对新中国上海城市各阶层有何影响？上海社会各行业又如何开展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这是本文的目的所在。^②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课题[2017-69]国家导向与地方经验：上海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特点研究（1956-1966）成果。

^① 有关海瑞相关研究，可以参见沈琦：《海瑞研究史综述》，闫广林主编《海南历史文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② 有关于《海瑞罢官》历史的一些细节，李逊《海瑞罢官：尚未披露点的史实》，《戳天之祸：三位小人物反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遇〉》文章均有突破。

一、上海市委《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文稿的改动

上海市委《关于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通知》发出于 1966 年 1 月 6 日，该通知由市委宣传部草拟文稿，在 1965 年 12 月 27 日草稿中，“意识形态领域中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①一语统领了草稿全文，但除此句以外，该通知更多限定《海瑞罢官》讨论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运动升级版。

草稿中称：“在学习中，应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看待一切事物。突破旧思想、旧传统的束缚，进一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②草稿还规定了学习范围与内容，第一步先要在党内主要党政领导干部和一部分宣传、文艺、教育干部中进行学习；市委区委处长以上级宣传、教育、卫生干部约计 816 人，宣传系统支部书记以上干部，编剧、导演、专业作家、编审以上约计 531 人，教育系统高等学校正副校长到初三以上的政治、文、史教师约计 2750 人，共计 4062 人。^③学习着重解决 5 个问题：“关于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关于国家与革命问题；关于道德能否继承的问题；关于历史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在上海市委发出的正式通知时，阅读材料基本未变，经宣传部长杨永直进行调整，通知正文有了较大变动：

其一，原题“关于批判《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和学习的通知”一度删改为“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通知”。正文打印稿中的“推动意识形态领域里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也被删替为“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标题与立意均接近于平和地进行学术讨论，但有些过激的话语仍被保留，如“目前报刊上正在展开关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不仅是对一出戏的评价问题，而是多年来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在上海应当抓紧的几项工作里，通知特别提出：“在报刊上展开充分地辩论，要放手发动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教育界等有关人员参加，摆事实，讲道理，开展百家争鸣，问题不得到适当解决，决不停止。”

其二，学习范围、具体内容被删，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简略地改为“学习内容以报刊上讨论的问题为中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著作，并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有关著作及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学习方法，以自学为主，认真阅读有关的文件和材料，市、区、县和直属单位的主要党政领导干部阅读的文件可以少些，讨论的次数可由各单位自行安排。宣传文教系统的

^①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学习通知（草稿）》，A22-1-939，上海市档案馆藏。

^②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学习通知（草稿）》，A22-1-939。

^③ 《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学习通知（草稿）》，A22-1-939。

干部读的文件应当多些，讨论应当认真。”^①

通知第四条又特别强调，“组织党外研究、教学、创作人员进行学习讨论。各种讨论、座谈会上无论党内、党外还是党内外一起讨论，均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辩论，分清是非。”^②

通知中开列了一批阅读书目，第一部分主要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篇章，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至七节，《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学习”一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论》第十五节“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节及第八节，以及《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此外还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六节“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和第七节“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中有关道德问题的两段话，以及《列宁全集》中的《论国家》和《青年团的任务》。第二部分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方求《〈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第三部分是吴晗有关海瑞问题的原材料，文章《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海瑞罢官〉(历史剧)》、《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参考书目特别指出，“毛主席著作和马、恩、列、斯著作中，有关阶级斗争、国家学说、道德、文化遗产、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的语录”也在学习之列。但草稿中一些时事材料，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陈伯达《批判的继承和新的探索》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及社论已经被删除了。

从上海市委的通知字面上看，上海对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限于党员群众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动，从参考书目来分析，书目虽包括毛泽东著作许多方面，但与后面的“时事材料”部分关联性不强，这也部分说明在《海瑞罢官》讨论的初期，上海也不能理解中央的意图，只能从惯性思维上理解做为一场新的学习运动来安排。

从1966年1月4日至1966年4月20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出版了25期关于历史剧讨论的简报，密集程度甚至一天两报。这些简报主要涉及上海文教、宣传、出版、科研各单位开展讨论的情况，语言多以当事人的谈话为主。

二、区级机关干部对于新编历史剧的讨论

上海市委通知特别要求，“首先抓好机关部、局长（直属科长）以上的干部和文化系统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机关部、局长每星期六上午集中在区委学习，文化教育系统干部，在一定时期也要集中讨论几次。一般干部学习要求可比上述

^①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通知》，A22-1-939。

^②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通知》，A22-1-939。

对象低一些，文件可以少一点。”^①市委的通知，到了上海各区的执行情况大相径庭。

“虹口区委书记李芝圃同志在十二天内就仔细阅读了《湖南运动考察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宣言》、《论国家》等九篇著作，并且认真写了四十多页笔记。在区委学习会上做了发言，很受欢迎。静安区委书记张竺天同志和教育卫生部长陈原同志等，为了钻研一个问题，经常学习到深夜。”^②这种学习到深夜的刻苦程度，更接近于宣传口径，难以让人相信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如1966年1月29日，静安区机关部、局长分三个小组对《海瑞罢官》问题进行了第一次议论，从会议纪录来看，有些同志“检查了自己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对《海瑞罢官》问题不关心、不重视，”有些同志认真地说：“这是学术界、文艺界的事，或看作只是对一个戏、一个人物的评价问题，与我们不搭界”。多数人都表示，我们“对历史不了解，看不懂，没有兴趣。”不关心、不重视、不了解、没兴趣，这种类似的话在其他区也多次出现，比如虹口区“一些同志检讨自己过去对此不关心，……与当前生产没有关系。工业部门有些负责同志本来感到这些文章太长，内容太专门，自己又不太懂历史，当前生产这么紧张，哪有时间看。”^③学习不够，学习材料过多也是抱怨的对象，“现在又要通读甲种本，又要精读四论，又要结合工作、思想问题学，又要讨论《海瑞罢官》，头绪太多了。有的讨论了一两次，改为精读《实践论》了。”^④

《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在上海区级机关学习中不平衡，少数单位对学习抓得不够紧，宣传部办公室批评说：“部分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讨论要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注意不够；有些单位领导干部，对市委通知当前学习主席著作主要是结合《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进行的意见，没有很贯彻执行。”^⑤所以，在各区机关干部实际学习讨论中，各区机关学习效果多半取决于自觉，消极态度占主流。

具体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上，区级干部们倒也不乏认真思索之处，比如某区工会主任薛映辉提出：“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应该是统一的，但在评价具体人物时怎样统一？历史人物如果都用阶级观点来看，那么只有农民革命领袖才是好的？”某团区委副书记周德英则提出关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问题，过去历史上写的人物大多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他们办事从主观动机上讲，都是为阶级利益服务的，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往往也做了一些对人民有利的事。如海瑞修吴淞江，隋炀帝开运河，秦始皇筑长城等。”^⑥

^①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通知》，A22-1-939。

^② 1966年2月5日，静安区各机关部、局长初次议论《海瑞罢官》问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印：《〈海瑞罢官〉问题讨论情况反映》（下文略为《情况反映》）第10期。

^③ 1966年2月11日各单位领导干部初步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一些情况，《情况反映》第11期。

^④ 1966年2月11日各单位领导干部初步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一些情况。

^⑤ 1966年2月11日各单位领导干部初步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一些情况。

^⑥ 1966年2月11日各单位领导干部初步讨论《海瑞罢官》问题的一些情况。

三、文化单位的态度

按市委布署，上海宣传文化系统各单位相继组织讨论，出版局、文化局相对比较重视，多数都是一星期讨论一次。

京剧院、越剧院、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图书馆、社会科学院部分研究所等，都已讨论过十几次。一般单位也讨论过五六次、七八次不等，但情况很不平衡，如文化局所属音乐单位讨论次数比其他单位普遍为少。合唱团近一时期在整顿领导，一次也未组织讨论。出版局所属单位中，人文分社和文化出版社只讨论过4次，科技出版社只讨论过两次。^①

但是文教系统大部分单位没有做到党员骨干学习先行一步，“看书看材料少，党内思想没有很敞开，领导学习也有缺乏“本钱”的现象。”而《海瑞罢官》问题与学习毛选相结合，有些单位很好安排。如京剧院、戏曲学校等单位都借口说：“目前任务重，工作多，学习也就抓不深入，他们对如何打局面，尚感信心不足”。

②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顾济之说：“《海瑞罢官》是一个学术问题，现在把它提高了。姚文元连海瑞修吴淞江都加以否定，这只要去找一下历史文献就可以解决的，……《海瑞罢官》在知识界中，看来影响是不大的，要么在历史学界有些影响。吴晗的涵养功夫不够，检讨得太快，把问题统统写上去了……”^③

出版社编辑认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讨论问题，给工作会带来很多不便之处。1966年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刘辉《应该怎样评价史可法》一文后，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谈宗英说：“民族英雄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应该增加。如果史可法不称民族英雄，历史上还有什么人可称民族英雄。”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人员认为，“现在将“民族英雄”与“清官”混为一谈，就感到越来越糊涂了。”辞海编辑所的编辑更是烦恼：“《辞海》又要大动了。弄不好，真可能出不了，这样糟了，历史书没啥好出版了”。^④

① 1966年2月5日，宣传系统各单位讨论《海瑞罢官》简况，《情况反映》第9期。

② 1966年2月5日，宣传系统各单位讨论《海瑞罢官》简况。

③ 1966年1月4日，出版系统一些党外人士对方求文章和吴晗“自我批评”的一些反映，《情况反映》第1期。

④ 1966年1月17日，辞海编辑所等单位部分人员对《应该怎样评价史可法》一文的反映，《情况反映》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多数工作人员说：“清官”问题涉及到对历史、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及如何对待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但中老年编审吕贞白，编辑胡道静很少发言，或只提一些史料，不涉及到真正的问题讨论。相对而言，党员身份的总编辑李俊民同志在会内会外，继续坚持“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的观点。^①而在上海京剧院，周信芳在与京剧院一党员干部谈话时说：“我们看问题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情况。”京剧院的罗稷南坚持“讨论应是对理对事，不是对人，不要给人戴大帽子。如何推动戏剧运动，是讨论的着眼点。”这些良心之论也保证了历史剧讨论的正常进行。^②

四、文史学界的反映

《海瑞罢官》是一部历史剧，在文史学界中的反映如何？基本而言，在《二月提纲》被撤销以前，文史学界的一些教授还是实事求是的在讨论问题。

在 196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8 日，《文汇报》发表了蔡成和、林丙义、张家驹、羽白、郝昺衡等上海知识分子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姚文元的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评。郝昺衡说：“姚文元谈《海瑞罢官》连历史上的海瑞也打了几棍子，这就太过份，太偏激了。”魏建猷说：“这次《文汇报》在大年夜召开会议，我看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到会的很多人不发言，有的迟到早退，发言的人其内容也一般，不着边际，据说文汇报还要将会议情况整理发表，那就大可不必了。”^③

1966 年 1 月 27 日，在接受社联拜访时的周谷城说：“历史研究，最重要的还是靠材料，靠第一手材料。……我同吴晗是朋友，我对他的批评很有分寸，他看了不会生气。一个人凡是他自己承认了的东西，你去批评他，他是不会有意见的；他自己不承认的东西，你硬压在他头上，那是会使人伤心的。”^④最有见地的当属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平心，他于 1966 年 1-3 月间先后发表了《漫谈清官》、《论“循吏”、“良吏”、“清官”的历史评价法》、《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批判问题》等文章。在一次座谈会上，他提出了“革命功利主义”的概念，深刻概括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

目前的讨论中有些人是采取敷衍态度的，见风使舵，谈得不深，这种学风不

第 5 期。

^① 1966 年 1 月 27 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讨论“清官”问题的情况，《情况反映》第 6 期。

^② 1966 年 1 月 8 日，郝昺衡、魏建猷、李平心、蒋星煜对目前《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一些反映，《情况反映》第 3 期。

^③ 1966 年 1 月 8 日，郝昺衡、魏建猷、李平心、蒋星煜对目前《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一些反映。

^④ 1966 年 1 月 27 日，周谷城、束世澂等人的一些反映，《情况反映》第 7 期。

好。讨论问题要给人思考的时间，现在往往今天接到通知，明天就要开会，不要说看材料，连想一想都没有时间，只是奉命开会，最多谈一点感想。这种会开不好，效果不会很大。以后开会最好能早一些通知，并列出的中心题目，让大家充分准备。讨论《海瑞罢官》是革命功利主义的需要，但对革命功利主义不能理解得太狭窄，除了争鸣的问题外，其他的学术问题也应该提倡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目前的学术研究不够深入，尤其是对史料不够重视，写出的文章一般化，只有观点，没有材料，这种倾向很危险。现在有种说法，罗尔纲、吴晗犯错误是因为书读得多，这是笑话！如果你有马列主义观点，再加上书读得多，不是更好吗？对百家争鸣、批判继承问题应该好好议一议，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一棍子打死”也是一种形而上学。^①

值得注意的是，李平之上述谈话并没有被采纳上报，随着政治空气的紧张，这段颇具道理的发言被弃之未用。

五、青年与工农群众讨论会比较

1960年代初期，由军队推动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在社会上方兴未艾，面对上海市委布置的《海瑞罢官》历史剧讨论任务，1966年1月13日，上海青年宫顺势安排组织了十多个第一、二期毛主席著作讲习班的学员讨论《海瑞罢官》。据档案材料，参加者一般都是前两期学习班中学得比较好的骨干，^②多为商店、工厂、街道的团组织干事、宣教科干事，他们大部分是在“四清”运动后提拔为基层团委、总支的专职干部。相较于学界的不言与机关的慎言，这几位年轻人在学习班上的讨论的可谓“初生牛犊”。

据会议纪录，这些年轻人认真讨论了以下问题：““清官”的含义是啥？如

^① 1966年1月8日，郝昺衡、魏建猷、李平心、蒋星煜对目前《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一些反映。

^② 名单如下：陈榴宝，第一百货商店团总支组织委员；窦家骅，上海有线电厂团委干事；吴忠伟，牯岭路街道团委少年委员；赵诚豹，第五印染厂政治处宣教科干事；聂祖仪，服装鞋帽公司团总支副书记；李远庆，矿产五金进出口公司干部；杜功柏，储运公司六家嘴仓库商品护理员；卫国林，黄浦区饮食公司糕饼学徒。

果没有清官，历史上的作用如何肯定。历史上没有清官，还有没有进步力量？看历史人物应当用什么标准？什么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些年轻人在这个“清官”实质是啥的问题上认真地讨论起来，其发言真诚而幼稚：

第五印染厂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赵诚豹提出问题说：“吴晗把海瑞描写成一心一意为人民，这是歪曲了事实。但厂里有人提出来问，姚文元把清官、贪官一律否定也太片面了，这样不是把文天祥、岳飞、秦始皇等已经肯定的都否定了？”

提出问题后，会场很活跃，大家觉得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吴忠伟问：“慈禧太后选了颐和园，现在我们也可以派用场，这点要肯定，但她又不是好人，如何评价？”

窦家骅觉得“像秦始皇统一中国，搞度量衡统一，这是应该肯定的。但秦始皇是暴君，开运河的隋炀帝是昏君，怎么能肯定呢？”

聂祖仪（服装鞋帽公司团总支副书记）回答说：“这是人民做的，是劳动人民的功劳。”赵诚豹又反问说：“命令是秦始皇下的，办法也是他想的？”

陈榴宝在发言中讲到：“要用阶级分析来看历史人物，凡是促进了生产发展时，都应肯定的。”聂祖仪就问：“照你这么说，美国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了，卫星、宇宙飞船上天了，对美帝国主义也要肯定呢？”陈榴宝（中百一店团总支）问吴忠伟：“照你这样讲法，用的是什麼标准？”吴忠伟回答说：“当然是过去的标准，不能用现在的情况去看。”窦家骅抢着说：“从当时的标准看，至少也要推动社会向前发展，比如农民想得到土地，这是当时农民的要求。就是要有历史观点嘛”。陈榴宝也说：“看问题应当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对历史人物也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他还没说完，赵诚豹就说：“当时还没有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

说怎么办？中国封建社会所以拖延了这么久，就是因为农民还不懂得阶级斗争。”

会议纪录最后只好如实地总结说：“争论结果，大家觉得“清官”和应该肯定的历史作用是两回事，但又觉得这中间的关系讲不清楚。大家觉得当时是没有马列主义，又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历史人物有点矛盾。讨论到最后，如何把阶级观点、历史观点统一起来看还是没有解决。”^①看起来非常热烈的青年人的讨论，由于缺乏学术训练的支撑，只能从朴素的逻辑出发得出简单结论，甚至根本无法得出结论。

1966年4月6日，《二月提纲》已被批判，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联合组织了一次批判《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曾参加过大革命斗争的老工人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共十二人，由于宣传和编辑稿件的需要，《红旗》、《学术月刊》、《哲学研究》杂志的潘梓年、吴传启、戚本禹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工人都是上海在十七年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部分人物在后来的上海也崭露头角。^②在忆苦思甜思维的惯性下和市委的安排下，“到会的工人同志都非常气愤，怀着强烈的阶级仇恨，纷纷指责《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他骂皇帝是假，骂党和我们敬爱的领袖是真。”

六、学术期刊的变化

在《海瑞罢官》讨论初起之时，本着学术认真的态度，1965年11月10日，《学术月刊》编辑部、《人民日报》社、《文汇报》社及华东师大等单位都派人到松江调查、搜集历史资料，进行田野调查。之后，1966年1月，经市委驻松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工作团党委和县委共同研究决定：由工作团文教卫生组负责人等组成“海瑞罢官问题调查组”，开展调查，撰写文章，投入学术讨论。调查内容主要有“海瑞修吴淞江”、“徐阶退田”、“海瑞祠庙”等。该组先后考证了徐阶在松江故址；至天马公社横山下收集明代土地关系资料；寻访了松江、青浦、嘉定、嘉善等地的海瑞祠庙，搜集民间传说，专程从老闸桥至黄渡、沿白茆河到常熟以探究海瑞修吴淞江的遗迹。最后写出了《欺世盗名屈乡宦》、《防民之变甚于防川》、《谁家生佛把香烧》等批判海瑞的文稿。但对“罢官”问题的争论，很快发展成为政治上和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各单位遂停止了对“海瑞罢官”的调查，文稿亦未公开发表。^③

^① 《上海青年宫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报告》，C26-2-153-71。

^② C1-2-5155，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本部和《红旗》杂志联合召开工人批判《海瑞罢官》记录整理。座谈会名单：杨富珍，女，35岁，党员，国棉一厂织布挡厂工；李素兰，女，35岁，国棉七厂档车工；张银荣，张庆才，孙长胜，李新宝，臧逢义，贺建民，王志文，庞秀英，袁鹤年，李增芳。有材料说明，此次工人的座谈会的发言曾经过上海市委安排学习演练。

^③ 上海市松江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松江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9页。

随着《海瑞罢官》问题讨论的展开,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学术月刊》编辑收到有关稿件共66篇,其中本埠30篇,外埠36篇,有关《海瑞罢官》及海瑞评价的有41篇,有关“清官”的稿件18篇,有关“让步政策”的有7篇。^①其中1966年3月《学术月刊》刊登了《松江县农民驳斥《海瑞罢官》——松江县城东公社部分贫下中农社员和干部座谈会纪要》,这种非论非叙的特殊文稿同,编辑部初审意见只好在说:“针对吴晗的论点,让农民群众来谈谈他对《罢官》的意见,这个主题是很好的,作者也花了一些工夫。但在写作上还有缺陷,文章冗长,文章材料也不清楚,既不像论文,也不太像调查报告,座谈纪要也不像。”^②

结语

在《海瑞罢官》问题讨论活动中。上海与全国其他省市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历史上的海瑞官至南直隶巡抚,府衙设在苏州;吴晗编写的《海瑞罢官》戏剧场景设定在华亭,属建国后的上海松江地区。其二,早在《海瑞罢官》剧目上演之前,上海京剧院已有《海瑞上疏》剧目的排演。因此,同一时期被讨论的历史剧不限于吴晗的《海瑞罢官》,同时涉及上海京剧院的《海瑞上疏》、田汉的《谢瑶环》等一批剧作。总体而言,上海虽然是《海瑞罢官》事件的起源地,但在《二月提纲》未被废止以前,上海大部分讨论会的气氛都比较缓和,甚至在文化局剧目工作室的会议中,做为《海瑞上疏》的作者,蒋星煜虽然受到冯少白的责难,但工作室会议总结时说:“冯少白的发言是个人意气,讨论要深入,不能起哄。”^③

但受全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海瑞罢官》事件的反转差异极大。上海戏剧学院的汇报是一个例证:“第一阶段,从姚文发表到《文汇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等报的按语为止,(教师)思想比较活跃,并提出了不少问题。……

不同意把《海瑞罢官》同1961年的“单干风”和“翻案风”联系起来,对这个戏是不是毒草表示怀疑。第二阶段,从《文汇报》转载《人民日报》等报编辑部按语,到吴晗的自我批评和方求一文的发表。在这个时期内,少数教师表示沉默,不再讲话。上阶段个别讲过错话或者发表过错误观点文章的同志,则到处检讨,非常紧张。”^④1966年4月5日,上海市委递交了《五个月来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情况报告》,最后报告的口吻完全适应了迎合了形势需要,把最初定性的

^① 《学术月刊编辑部关于1965年11月至1966年2月〈海瑞罢官〉问题讨论以来收到稿件的情况》, C43-2-258-42。

^② 松江县农民驳斥《海瑞罢官》,《学术月刊》1966年第3期原稿, C43-2-286-189,

^③ 1966年2月12日,文化局剧目工作室讨论《海瑞罢官》情况的反映,《情况反映》第12期。

^④ 1966年2月18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讨论《海瑞罢官》的情况,《情况反映》第15期。

学习运动彻底错误地总结为文化学术的阶级斗争：“从上海来看，在各个学术、文化部门中，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学术、语文艺思想尤其有着深厚的根源，资产阶级“权威”对学术、文化的垄断也尤其仍着牢固的基础，因而，斗争就显得更为必要，更为迫切，也更为艰巨和复杂，更需要坚定地、长期地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①

诚然，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建国以来，党内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于历史著作与历史人物的阅读兴趣，导致对于历史著作和人物的批判与评价往往成为历次运动的靶向所在，在《二月提纲》被撤销之前，上海社会对于《海瑞罢官》的讨论基本处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活动范畴之内，不具备学术判读能力的年轻人认真而幼稚地讨论历史问题，市区机关干部或紧或松的进行学习，《学术期刊》进行如实的调查，多数知识分子亦有良心之论。但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恶化，工农群众只能适应政治形势而高声痛骂，知识界最终变得哑口无言。从《海瑞罢官》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上海的文教宣传与学术研讨开始进退失据、无所依归。

^① 《五个月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报告》，A22-1-942。